

“九·一八”事变前后外交部见闻

宿梦公*

一、我进国民党外交部工作

1931年6月间，我和友人孙秉乾由日本留学回国到南京旅行并寻找工作。7月间经留日前辈、当时任外交部次长的王家桢介绍进入外交部工作。我们入部后派在亚洲司四科任科员。我们名义上分在四科，但所作的是掌管日本业务的一科工作。

“九·一八”事变后，亚洲司是主管司，工作繁忙紧张。为了集中全司力量应付这一事变，我的工作由翻译日文改为协助当时管理亚洲司档案的科员朱震，并建立有关“九·一八”事变的新档案，因此见闻较多。

二、“九·一八”事变后在外交部的见闻

改变臧式毅电文内容

我到外交部工作不过两个多月，就爆发了“九·一八”事变。事变发生后，当时留守沈阳的辽宁省主席臧式毅急电告外交部，说“日军突然向我驻沈阳北大营王以哲旅发起进攻，我军寡不敌众，北大营已被敌人占领，王已阵亡”等语。消息传来，举国震惊。

但外交部指示当时正在日内瓦国联开会的代表施肇基立即

* 作者当时系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第四科科员。

通知国联的电文内竟把日军进攻沈阳北大营，改成“中日两军在北大营发生冲突”的辞句。此电稿出于亚洲司一等科员白德俊手笔。当我将此电稿归档时，我反复阅读，感到诧异。臧电内容明明说日军向我发动进攻，怎么能说是中日两军在北大营发生冲突？一方向另一方进攻与双方发生冲突，其含义不同，明眼人一看便知，怎么可以混为一谈？电稿虽是白某所拟，而电文内容当然是根据上级指示，一个小小的科员岂能擅专？特别是改变臧的事关重大的来电内容肯定是出于上级指示。那么作为外交部长的王正廷究竟用意何在？莫非是根据蒋介石的意旨？当时我百思不得其解。

1940年年底，我奉外交部命令从上海来到抗日后方的重庆，回部报到。当时王正廷已出任驻美大使。据一位从驻美使馆回部的老同事说，王在“九·一八”事变后被学生打下台来，曾被国民党监察院弹劾，停止任用5年。王出任驻美大使，是他5年来第一次重新任用。监察院究竟为什么弹劾王？是否与他在“九·一八”事变后第一次指示施肇基的电文有关？这是耐人寻味的。

犬养毅暗示国民党政府要抵抗

我在南京外交部时部内盛传，日本继田中义一任总理大臣的政友会总裁犬养毅（孙中山的老友），曾通过某种渠道暗示国民党政府：以后中国对日本军队少壮派发动的对华侵略一定要抵抗。否则，日本军队里的少壮派军人更会认为攫取中国领土是轻而易举的事，并会指责主张慎重对华政策的保守派老政治家们为老弱无能。而且长此下去，日本政府也将无法控制等语。这一传说，真假莫辨。犬养毅在1931年12月组织政友会内阁，距离“九·一八”事变后不过两个多月。在他任首相期间，一方面不仅日本侵略军在东北继续进攻，到1932年1月已经占领

了整个东北三省；而且在1932年1月28日夜间日本侵略军在上海由租界向我闸北一带进攻，发生“一·二八”事件。另一方面，同年日本国内发生“五·一·五”事件，犬养毅竟被日本少壮派军人刺死。不知是否与上述传说有关。

回忆事情经过，即由传说犬养毅暗示国民党政府对日侵华要抵抗到他被刺死，也不过半年多的时间，事情的巧合，值得深思。

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

当时蒋介石正在集中力量“剿共”。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强调“攘外必先安内”。他认为消灭“共军”比什么都重要。抗日期间在重庆时，流传着蒋说的一句话：“宁肯亡给日本，绝不亡给共产党。”说明他反共思想是根深蒂固的。何况日本侵略军进攻东北，蒋认为这正可借日本侵略军之刀削弱张学良在东北的势力，使张以后可以服从他，这将大有好处。因此，蒋命令正在北平的张学良将军同吉林省主席张作相以及黑龙江省主席万福麟等东北军主要将领，对日本侵略军不要抵抗，并令他们把军队撤到关内，一切由“国府”通过外交途径静候国联处理。张误信并以为国联可能作出合理的处理，可能迫使日本侵略军撤退，从而服从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坐失东北大好河山。

三、“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南京情况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南京群众特别是学生，群情激昂，愤慨万分，成群结队走上街头，不仅游行示威，还到处张贴标语：“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从东北滚出去”等等。同时学生还向街上行人演讲，告诉人民：侵华日军已公开大规模武装侵略我东北三省，我东北已处于日军铁蹄之下，我东北同胞已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我们的国家已到危急存亡的边沿。我

们唯一救亡的办法，只有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一致对外，等等。并要求“国府”向日本提出严重抗议，谴责日本侵略一个主权国家的领土和主权的完整，同时向世界各国呼吁主持公道，迫使侵华日军由东北撤兵，还我河山。而且特别攻击国民党外交部丧权误国。当时，我亲眼看到这些情况。

四、外交部长王正廷在纪念周上讲话

外交部每星期一举行纪念周一次，全体职员参加。纪念周的程序是首先由主持纪念周的人（多半是部长或次长）默读孙中山先生的遗嘱，然后由部长或次长，有时指定地区司的司长作有关国内外形势或业务的报告。

这次是“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一个纪念周，因此，由部长王正廷亲自主持。这一天王照例是西装革履、裤线笔挺。不过他面现忧色，讲话声音低沉，一反常态。

王的讲话大意是，这次事变激起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我国是一个有强大武力做后盾的强国，日本帝国主义焉敢肆无忌惮地大举侵略一个主权国家。接着王讲了一段日俄战争的历史。他说：“当时帝俄把满洲视为它的势力范围，不断向满洲发展。而日本自从获得朝鲜后，也引起它向满洲发展的野心。这是日俄发生战争的主要原因。帝俄想独吞满洲，不仅与日本为敌，而且也引起美、英、法等列强的嫉妒和不安。因此，战争时期日本得到列强的暗中支持。当时帝俄在满洲的陆海军实力并不雄厚，战争结局日本战胜了帝俄。这时美、英、法等列强认为时机已到，出面调停，压迫帝俄转让旅顺、大连两港口和南满铁路（由长春到旅大的铁路）。这不过是转让由中国获得的既得权益而已，帝俄并无多大损失。在和谈会议上，日本的首席代表小村寿太郎不满足和谈条件，坚持要求帝俄赔款。

而帝俄代表态度强硬决不退让（帝俄准备调黑海舰队，同时陆军方面也准备动员），甚至扬言不惜再战。小村了解自己国家的实力，如果继续战争，胜败莫测。因此，小村向当时以桂太郎为首相的政府报告和约条件，并做了说服工作，获得政府批准，得以在和约上签字。日俄和约完成后，小村返国时被日本国民视为外交上失败的代表，而不是胜利的英雄。日本国民对小村谴责辱骂，怪他为何不向帝俄要求赔款，甚至有人叫喊要打死小村。”

王最后说，群众只是感情用事，而不了解国家实力，瞎哄一气有何用处？言语之间；显然是说，只有当政的人才了解国家的实力，感情用事无济于事，甚至会招来亡国之祸。因此，必须“知己知彼”，才能用理智克服一切。

五、王正廷被学生殴打下台

王在纪念周上讲话不久，一天南京各大专院校学生汇合外地来京请愿学生不下数千人，每人手持标语小旗，队伍前面打着各校校旗，组成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最前面由学生拥着当时中央大学校长朱家骅，沿途高喊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从东北滚出去”、“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一致对外”等等。游行队伍到达南京鼓楼后，直奔外交部请愿。当时外交部的办公楼是两幢旧式楼房，部次长的办公室是在北楼，南楼上下是地区司办公室。学生队伍撞进外交部后，直奔两幢楼房。学生到了南楼，所有职工都感到惊慌。但学生们对职工说，不要怕，与你们无关，我们要找王正廷算帐。不多时只听得北楼人声嘈杂，打砸之声不绝于耳，我们这些在南楼的职工不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在人人感到惶恐不安的时候，特别是我们司里兼代司长徐谟，他是苏州人，比较胆小，当时被这种混乱

情况吓得发呆，不知所措。因为掌管有关“九·一八”事件的档案我也有责，特别是部里与施肇基的来往机密的电报卷宗正在徐处使用。因此，我就跑到司长办公室问徐是否还用，如果不录用，我就要收回放进保险柜，以防万一。当时看见徐的惊慌不安的样子，我也感到有些紧张。因此，我就向徐建议由我陪同从部里东北角后门出去在马路上暂避一时，等到学生队伍走后再回部。徐对于我的建议点头同意。于是由我和徐分提公事包各一个，我在前面带路，徐紧跟在我的后面。当我们刚走到后门时，只见两个人（一个是部长办公室的工友、另一个是王的秘书）架着满头血迹的王正廷狼狈不堪地匆忙走出后门，乘上已经停在后门外的部长专用汽车急驰而去。我和徐都清楚地看见王，王当然也看见我们，双方都未敢打招呼。

学生队伍在捣毁部长办公室并打伤了王正廷后，边喊口号“打倒卖国贼”，边整队伍离开外交部。

事后，据在南楼办公的职工说，当部分学生撞进南楼时，看见楼下客厅里坐着一人，误认为是外国使节。此人是政务次长李锦纶，因被认为是外国使节得以幸免。

学生到北楼未进客厅，直奔楼上。上楼后，撞进王正廷的办公室，见王正在办公。学生齐喊“打倒卖国贼”，并用手中的标语小旗向王打去，最后有人将王的办公桌上放着的一盆花向王头上砸去，王的头部当即开花，血流不止。王后来引咎辞职。

六、顾维钧出任外长，提议划锦州为中立区

王正廷被打下台后，“国府”明令特任在日内瓦开会的施肇基为外交部长。施以工作需要并未回国就任。在此过渡时期，外交部的一切重要部务，临时多由宋子文决定。因此，兼亚洲司司长徐谟每日一次或多次去北极阁宋公馆汇报形势或参与会

议。为时不久，“国府”改任张学良派去南京作外事咨询代表的顾维钧出任外长。

顾在上台前，即将他的划锦州为中立区的设想征得蒋介石的同意。因此，顾上台后，立即电令在日内瓦的中国首席代表施肇基向国联提议：把我国辽宁省锦州划为中立区，并要日军停止前进，而以中国在东北的驻军调进关内为交换条件。

顾在一次会上为他的提议辩解说：只有这样，可以阻止日军继续前进，至少可以维护锦州到山海关二百多公里这一段领土的安全，并可以维护平津两地以及华北地区的安全。不然的话，日军将直趋山海关，那么华北地区也将危在旦夕。

顾的这个提议，完全是丧权辱国行为，引起在京学生以及各地来京学生的极大愤怒。于是学生结队直趋外交部找顾质问。学生在部里各处搜查找不到顾，盛怒之下，捣毁各处办公室，并用墨笔在办公室墙上书写“打倒卖国贼顾维钧”大字标语后，才离开外交部。

学生当时找不到顾，那么顾到哪里去了？顾自到南京后，吸取王正廷挨打的教训，一直住在国民党励志社内，有军队警卫，比较安全，并对外保密。部里也只有徐谟少数人知道。

自从学生捣毁外交部后，顾越发不敢白日到部，几乎整日隐藏在励志社内办公，不敢出头露面，只有晚间到部办公，一般都深夜去。

（摘自《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一书，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